

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研究

宋一平 刘鑫焱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华中地区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的音乐活动也随之成为根据地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的主体。新四军抗战歌曲始终与战争现实紧密结合，不仅创作成果数量可观、艺术风格鲜明，相关音乐活动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新四军抗战歌曲为支援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巩固根据地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也由此成为中国抗战文化中独特的音乐类型。目前，学术界鲜有将新四军抗战歌曲置于战争视域下，探讨其发展脉络与功能价值。而这些创作实践及其宝贵经验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能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现实启示。

[关键词] 新四军；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音乐；抗战歌曲；歌咏活动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088-07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11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和歌咏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活动不仅反映了其与军事斗争、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关联，更在支援军事斗争、巩固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作的新四军音乐，也因此成为抗战音乐中一种独特的类型。限于本文篇幅与所掌握的史料，笔者主要以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以此管窥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音乐的整体景观。

从研究现状看，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领域的抗战音乐研究尚显薄弱。既有研究多为描述性文字，鲜有将其置于具体军事斗争的语境中，探讨反“扫荡”、反“围剿”、游击战、阵地战等作战样式与音乐创作的内在关联。值得强调的是，新四军抗战歌曲凸显音乐的战斗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

值。抗战时期，新四军的音乐队伍不断壮大，呈现出趋于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其间涌现的大量优秀作品被广为传唱，歌咏活动频繁开展，不仅极大地营造了抗日救亡的浓厚氛围、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更以歌颂党和军队、服务革命军事斗争的鲜明导向成为蔚为壮观的抗日诗篇。

一、新四军抗战歌曲发展的历史语境

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发展，始终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实践深度交融，形成了兼具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是影响该地区抗战歌曲创作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在音乐形态、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等方面都有体现。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抗战歌曲更多以“精

作者简介：宋一平，博士，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刘鑫焱，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歌曲史料整理与研究”（25YJC760089）。

神武器”存在，不仅积极呼应了军民的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等现实需要，更在具体的战斗与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现实作用。

（一）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1937年，活动于南方八省的红军与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对外挂牌办公。部队整编完成后，随即挺进江南，与日军展开多次激战。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在军部大会上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并先后成立了江北、江南两个指挥中心，开辟了大量敌后游击战场与抗日民主根据地。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力量不断壮大，这一态势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深感不安。为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势头，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多次发动针对新四军的摩擦、围攻行动，使新四军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的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与声讨。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勾结，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发动多次残酷的大“扫荡”。在困局面前，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凭借周密的作战计划与灵活的战术，多次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攻势，相继取得蒋河口战斗、新塘战斗、繁昌保卫战、父子岭战斗、皖南反“扫荡”、金牛山战斗等一系列胜利，为抗战反攻阶段与抗战胜利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新四军发起车桥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斗，大量歼敌，解放众多城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展开反攻，最终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赢得了抗战的完全胜利。

（二）新四军文艺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发展紧密结合了新

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和“为兵服务”的宗旨，成为其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新四军军部由武昌迁到南昌，随即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下设戏剧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1939年后，由沈亚威担任歌咏组组长，章枚等音乐家参与了歌曲创作，并积极推动了歌咏活动的开展。新四军的教导总队文化队也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支重要的文艺宣传队伍。1938年，何士德应陈毅邀请加入新四军。后来，新四军在教导总队戏剧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文化队，并由何士德担任队长。为进一步培养文艺骨干，该文化队整合了戏剧训练班资源，由何士德担任班主任、扬帆担任指导员，并招收了70余名学员。文化队教授音乐、戏剧及军事理论等知识，进一步壮大了新四军的音乐创作队伍。

战时音乐人才培养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在根据地培养更多服务抗战的专业文艺干部，刘少奇、陈毅等商议决定，在盐城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下设四个系，并组建实验剧团。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举行了成立大会与开学典礼。由刘少奇兼任院长，何士德担任音乐系主任，教员有章枚、孟波等。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虽存在时间不长，但却是华中地区一所重要的专业艺术院校，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何士德、章枚、孟波等人发起成立了“苏北歌咏筹备委员会”，进一步促进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的发展。由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地处抗日前线，时常面对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多重包围和“扫荡”，并有师生牺牲，因此，新四军军部决定，自1941年8月起停止办学，并将其重组为两个文艺团体，继续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战文艺宣传与人才培养工作。这个时期，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新四军音乐干部训练班、前线剧团、抗敌剧团、拂晓剧团等大量的战时文艺团体，极大地活跃了根据地的歌曲创作氛围。

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中汇聚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人才，有大量的音乐家受邀或慕名而来，如何士德、章枚、孟波、沈亚威等，他们在军旅生涯中不断成长，并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此外，在新四军军部及直属单位从事文艺工作的音乐工作者力量亦很可观。这些人员或是新四军引进的专业创作者，或是在战斗与宣传实践中历练成长起来的骨干，广泛分布于新四军各师及直属文艺团体中。如一师有沈亚威、龙飞、陈大熒、梅滨、张锐等，二师有孟波、黄燊、晓河、洛辛、胡士平、何仿等，三师有章枚、刘亚、张天虹、吕若曾等，四师有沈琪生、刘凤锦、林琳等，五师有邓耶、杨景成、瞿民等，六师有涂克、黄菁、田芜等，七师有管荫深、东峰等，苏浙军区、浙东纵队有张大鹏、戈杨等^[2]。这些音乐工作者以高昂的斗争热情深入到军旅与群众的战斗生活中，创作出众多以抗战歌曲为代表的经典军旅音乐，为新四军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作出了极大贡献。

二、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紧跟战斗现实，回应了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问题。在艺术风格上，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广泛撷取江浙等地区的民间音乐元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精神风貌，成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鲜明的文化标识。音乐创作人才秉持严谨的态度，以专业的作曲技法，创作出大量历经战火淬炼、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新四军的每个师及其下属部队都有专门的音乐工作者，他们根据战斗的现实形势与宣传需求进行创作，展现出因时、因势、因需的“实用理性”。当前，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创作研究已逐步引起学术界重视，新四军歌曲编委会编的《新四军歌曲》^[3]和新四军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编的《新四军音乐文化图谱》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特别是《新四军歌曲》，收集了1937年10月至1947年1月在新四军中创作与流传的歌曲496首，歌曲按部

队编制序列分类，以“军部、一、二、三、四、五、六、七师、浙东纵队及其所在地区分编”^[4]，集中展现了新四军抗战歌曲的发展全貌。

（一）展现并助力军事斗争的抗战歌曲

毋庸置疑，在新四军抗战歌曲涵盖的众多主题中，表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与具体战斗情况是新四军抗战歌曲最突出的主题，相关作品的数量最为庞大。这些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为新四军军事斗争的开展凝聚了精神力量。这类歌曲大致有两个创作指向：一是旨在打击、瓦解日伪军，表现新四军开展的反“扫荡”等作战行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表现新四军的自卫反击斗争。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方当作前方，进行了无数次大小战斗，为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紧密贴合战争现实是新四军抗战歌曲的突出特征，亦是这类音乐历经战火淬炼展现的“实用理性”的集中体现。这些歌曲多带有较强的具象性，鲜明的叙事性特点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献”，表现和记录了具体战役的作战态势。同时，创作者通过设计旋法、节奏等艺术方法，将强烈的抗日热情寓于音符之中。

相较于同期及以往的许多歌曲，新四军抗战歌曲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与军事斗争的共时互动关系，如《繁昌之战》（曲再之、吴蕾词，何士德曲）、《父子岭上》（林因词，何士德曲）、《高家庄打胜仗》（晓河词曲）、《战洪山》（邓耶词曲）、《涟水之战》（邱成章词，何仿曲）、《保卫四望山》（杨景成词曲）等，均是其突出代表。尤其是何士德作曲的《繁昌之战》，在当时的华中地区广泛传播，引发了军民的强烈共鸣。歌词具有强烈的写实意味，音乐则将号召性与叙事性相结合，通过前后情绪的鲜明对比，生动再现了新四军在繁昌战斗中的英勇顽强与光辉历史。歌曲一经创作完成，便广为传唱，不仅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极大地提振了全军将士与华中根据地民众的抗战信心。

针对日伪军在华中根据地实施的残酷的“清乡”与“扫荡”，新四军广大音乐工作者积极开展创作，旨在揭露其罪行，反映根据地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新四军挺进江南后，日军多次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后，日军联合汪伪政府集合大量兵力，对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与“清乡”运动，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大量无辜百姓。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怀着仇恨之情，与之展开一系列反“扫荡”作战，予以有力回击。受此影响，诞生了《坚持苏中疆场》（沈西蒙词，沈亚威曲）、《金牛山上打胜仗》（许平词，黄粲曲）、《反投降小调》（孟波、田平词，孟波曲）、《抗战到底》（钱亦石词，孟波曲）、《反“清乡”胜利之歌》（吴强词，陈大莢曲）、《粉碎敌人八路扫荡》（方林词，吴彤曲）、《武装保家乡》（罗亦诗词，梅滨曲）、《真金不怕烈火烧》（林放词，沈亚威曲）等大量作品。同时，许多歌曲以昂扬奋进的斗争话语，歌颂了新四军带领广大民众机智勇敢地粉碎敌人扫荡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与热情。

在这一时期，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迅速，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通过不同方式阻碍抗战进程。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镇压，新四军团结广大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给予了有力回击，取得多次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新四军在民众中的抗战威望。这些光辉历程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到当时的抗战歌曲中，先后诞生了《别了，皖南！》（袁国平词，任光曲）、《黄桥烧饼歌》（李增援词，章枚曲）、《保卫郭村》（陈毅词，章枚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鲁军词，贺绿汀曲）、《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曲）、《准备打大仗》（晓河词曲）等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别了，皖南！》虽非专门表现国共摩擦的主题，但其隐晦揭示了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与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所谓“皓电”，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赴长江以

北。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词，并邀请任光谱曲，后定名为《别了，皖南！》。歌曲饱含新四军战士对皖南战斗生活的留恋之情，同时又以鲜明的军鼓节奏彰显出将士们勇往直前的崇高形象，歌词中“扬子江头、淮河新道”的表述直指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成为激励部队执行任务、坚持抗日斗争的精神力量。

歌曲《黄桥烧饼歌》以饱满的音乐情绪刻画了黄桥战役的战斗情形。1940年10月，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发起了黄桥战役，新四军以少胜多，以七千余人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数万人，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黄桥人民踊跃支前，家家开炉，几天内赶制数以万计的黄桥烧饼送到前线，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这些场景在歌曲中得到鲜活呈现。歌曲运用附点节奏和频繁的力度变化，以6段歌词朴实地抒写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表达了军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民族精神。

此外，《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曲）、《打个胜仗哈哈》（沈西蒙词，沈亚威曲）等作品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刻画了新四军在面对日伪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双重困难面前展现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打个胜仗哈哈》采用主歌和副歌结合的结构，通篇洋溢着部队打胜仗之后的喜悦之情。这首歌曲运用了“一领众合”的形式，配以方整的曲式结构和流畅上口的旋律，兼具群众性和战斗性，既彰显了“人民战士威武又雄壮”的光辉形象，又歌颂了“到处开展游击战，到处都打漂亮仗”的胜利成果。这些歌曲一经创作便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传唱，不仅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更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军民对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

在新四军抗战歌曲中，还有大量作品生动展现了华中根据地建设和军民战斗生活情况，如《保卫麦收》（许平词，吕蒙曲）、《开荒生产》（陈

大茨词曲)、《生产抗战》(晓河词曲)、《浇菜歌》(晓河词曲)、《渡长江》(赖少其词,何士德曲)、《整训歌》(晓河词曲)、《夜行军歌》(集体创作)、《擦枪歌》(吕冈之词,张天虹曲)、《练兵歌》(章洛词,洛辛曲)、《射击军纪歌》(司徒扬词,章枚曲)等。这些歌曲在部队中广泛传唱,并时常被音乐工作者拿来在部队文化生活中表演,深受战士们们的喜欢。这些歌曲既满足了战士们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起到了现实的指导意义,更为我国军旅音乐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塑造党和人民军队英雄模范形象的歌曲

对党和人民军队英雄模范形象的塑造,是新四军抗战歌曲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表现对象为新四军及抗战、劳动英雄。

在表现新四军崇高形象的歌曲中,最典型且传唱度最高的当属《新四军军歌》(陈毅等词、何士德曲),歌曲以坚毅雄沉的音调表达了新四军征战南北的光辉历程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抗战光荣使命。据曲作者何士德回忆,1938年3月上旬,在一次欢迎周恩来同志到皖南的报告会上,大家邀请他演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陈毅随后用法语演唱了《马赛曲》。“报告会结束后,陈毅同志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5]。创作新四军军歌的工作交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主持。1939年3月30日,陈毅率先完成歌词初稿《十年》。4月上旬,歌词送达军部后,由项英主持,叶挺、袁国平、李一氓、朱镜我等进行二度修改,完成了《新四军军歌》修改稿。6月下旬,项英、袁国平等人再次同陈毅研讨商议歌词内容并定稿,后由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的作曲家何士德三易其稿,创作才最终完成。1939年7月1日,在新四军庆祝建党18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首演,由何士德担任指挥,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随即,经新四军党委决议,将该曲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后发表在1939年10月12日出版的新四军《抗敌报》上,并将油印歌谱散发到

各部队中进行学唱。很快,这首作品就传遍了整个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其《重返新四军占领区》一文中曾写道:“没有另一支军队像新四军这样得到人民如此充分的信任、称赞和热爱。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我们是铁的新四军!’”^[6]可见,这首作品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传唱度与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在歌颂英雄人物的歌曲创作中,比较典型的当属晓河于1944年创作的《罗炳辉射击手》。罗炳辉在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师长,他具备极高的射击技术与战斗能力,一度成为新四军战士们尊敬和仰慕的对象。1944年,为了更好地继续迎接战斗,“新四军开展了一个以射击、投弹、攻坚、刺杀四大军事技术为主要训练目的的大练兵,与此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罗炳辉射击手’的练兵运动。《罗炳辉射击手》这首歌曲,就是在全师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学习罗炳辉射击手’的练兵运动中产生的”^[7]。

《罗炳辉射击手》以生动的音乐语言刻画了罗炳辉用枪如神的形象,歌颂了英雄罗炳辉刻苦训练的坚毅品质。歌曲诞生后即在于部队广泛流传,成为歌咏比赛的必选曲目之一,并对当时新四军的练兵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现实指导意义。而《战斗英雄朱长明》《模范战士赵老三》《模范党员沈进洪》等作品,主要通过颂扬抗战英雄的模范事迹,树立典型与榜样,进而鼓舞广大军民奋勇争先、抗战报国。

此外,《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铁军》(朱镜我词,何士德曲)、《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何士德曲)、《敬礼!新四军》(沈西蒙词,沈亚威曲)、《新四军真能干》(铁丽词,麦波曲)、《勇敢队》(李增援词,章枚曲)、《战斗英雄朱长明》(陈庆良词曲)、《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姜旭词,沈亚威曲)、《模范战士赵老三》(吴江词,郎静曲)等,均是这方面的佳作。

（三）反映局部反攻与庆祝胜利的相关作品

1944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率先进入局部反攻阶段，粉碎日军多项作战计划，主动发起多次攻势作战。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大片领土，为全国抗战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1945年8月，抗战宣告胜利后，盘踞在华中高邮的日伪军拒不投降，同年12月，新四军发起高邮战役，是“对投降日伪军的最后一击”^[8]，解放了全国范围内最后一座仍被占领的县城，大量歼敌、缴获武器。这一阶段的新四军抗战歌曲着重以“歌颂局部反攻胜利、鼓舞军民决战决胜、庆祝抗战胜利”为主题，反映了中国抗战最后阶段的历史面貌。

反映局部反攻与庆祝胜利的相关作品，一部分聚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时代背景下，新四军勇往直前地向敌人发起最后进攻的气势；另一部分则以歌颂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的作战神威，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独裁专制的反动行径，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主。此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诞生了一批洋溢着欢呼雀跃之情、歌颂民族解放胜利的歌曲。这些作品表达了军民对抗战胜利的热烈欢呼，传递出对民主建国的急切渴望，在根据地各种庆祝活动中被广泛演唱。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这些作品也成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歌曲的最后一批集中代表，此后的歌曲创作继而转入新的民族解放斗争任务之中。

其中，较具代表的作品有《抗战形势天天好》（何秋征词，刘鹏曲）、《敌后进行曲》（潘澄词，梅滨曲）、《前进！解放区的军民》（陈大荧词曲）、《柏林城上红旗飘》（采衡词，晓河曲）、《进军曲》（晓河词曲）、《保卫我们伟大的胜利》（张锐词曲）、《反攻进行曲》（晓河词曲）、《胜利赞》（晓河词曲）等。

新四军的抗战歌曲创作，以高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密贴合抗战时期的军事斗争形势，

既反映了军事作战样态，又为军事斗争和部队建设服务，起到了瓦解和打击敌军、鼓舞军民士气、争取外围支持的现实功能。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与标识性，体裁多样，以刚劲豪迈的进行曲为主，兼具现实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具辨识度与实践价值的独特类型。

三、新四军中的歌咏活动及传播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咏活动始终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从现有文献史料看，相关记载主要聚焦于新四军系统内的歌咏活动。在中共中央与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推动下，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歌咏活动蓬勃发展，抗战歌声响彻江、淮、河、汉等广袤大地。这些歌咏活动成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战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度融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军事斗争实践之中。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记述：“总部和后方，每到星期六晚上，就举行唱歌、跳舞和演剧，在前方，这些每月至少要举行一次。每大队，甚至每连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演剧队，演戏的和编戏的都是他们自己训练出来的。”^[9]这一记载足以印证歌咏活动在新四军军旅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和重要地位。

抗战歌咏活动在新四军中广泛开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宣传的优良传统。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军中陆续组建了战地服务团、文化队、华中鲁艺实验剧团、前线剧团、抗敌剧团、拂晓剧团等抗战文艺团体，他们深入军队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之中，正如新四军文艺战士晓河所言：“新四军文艺活动最突出的表现，一是戏剧，一是歌咏，群众化的歌咏活动是新四军主要的音乐活动。”^[10]

开展歌咏活动已成为新四军日常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每次集会都常有抗战歌声相伴。此外，一系列专门的文艺汇演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1939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泾县云岭的陈家大祠堂举行庆祝七一晚会，新

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文化队联合演出,演唱了《新四军军歌》和四部合唱《国际歌》,由何士德指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连连称赞:“奇迹!奇迹!新四军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11]皖南事变后,在“三一八”政工会上,举行了抗敌剧团、大众剧团、四旅抗敌剧团、五旅前锋剧团、六旅战斗剧团五大剧团汇演,并产生了一批新作品,会议结束时,政治部还为晓河颁发了歌曲创作奖。在新四军音乐干部训练班举行结业汇报演出时,贺绿汀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进行了首演,受到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的热烈欢迎。这些相对专业的歌咏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歌曲的创作与传播。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开始更深入地走进工农兵,不仅组织开展大量群众歌咏活动,还经常下连队教唱抗战歌曲。每个连队都设有俱乐部,并配备了文化教员,部队的歌咏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收效显著。除部队歌咏活动得到发展外,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十分注重当地农民的文化动员工作。晓河曾回忆:“在根据地里,那种处处是歌声的局面,真是一个奇迹。以淮南根据地为例,淮南根据地有12个县政权,工、农、青、妇、儿等群众团体17万余人,小学700余所,地方武装2000余人,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咏大军,从而形成了空前的农民歌咏运动。”^[12]这种全民参与的文艺思想与政策,推动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歌咏活动的火热开展,成功配合了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文化动员工作。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歌咏活动,受敌后战争限制,大都以游击战的方式灵活开展。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音乐活动形式上,也体现在演出团体的组织形式上。许多团体的组织架构调整频繁。基于战时思维特点,从素材收集、艺术构思、歌曲创作,到修改打磨、排练上演,通

常在一天之内完成。可以说,抗战歌曲既是活跃军队与百姓战时贫乏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政治工作与文化动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与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新四军抗战歌曲得以大规模集中创作,并形成了独特风貌,其不仅成功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与新四军的抗战和政治宣传工作,也及时满足了军民的战时精神文化需求。

四、结语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歌曲,是动员军民、建设根据地的重要精神力量。它记录了革命历史,反映了军民精神世界,是研究抗战文化的独特文本。新四军抗战歌曲数量可观、艺术风格鲜明,其歌咏活动内容丰富并注重现实关切,在推进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曾在新四军中工作及由新四军培养的诸多音乐人才,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成为革命音乐工作与文化战线的骨干力量。这些创作实践及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对我国军旅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创作具有重要启示。同时,该领域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間,相关史料亟待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尚需系统阐释,作为红色音乐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路径亦有待探索,这需要学术界持续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李光明,范天娇.云岭烽火淬炼新四军精神[N].法治日报,2021-07-12(8).
- [2][11]新四军音乐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新四军音乐文化图谱[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14,13.
- [3][4]《新四军歌曲》编委会.新四军歌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36,706-707.

(下转第101页)